

国学
经典
文库

图文珍藏版

孔子家语

孔子
家语

领悟圣哲思想智慧

萃取中华文化精华

〔春秋〕孔子·原著 马博·主编

线装书局

文库

孔子家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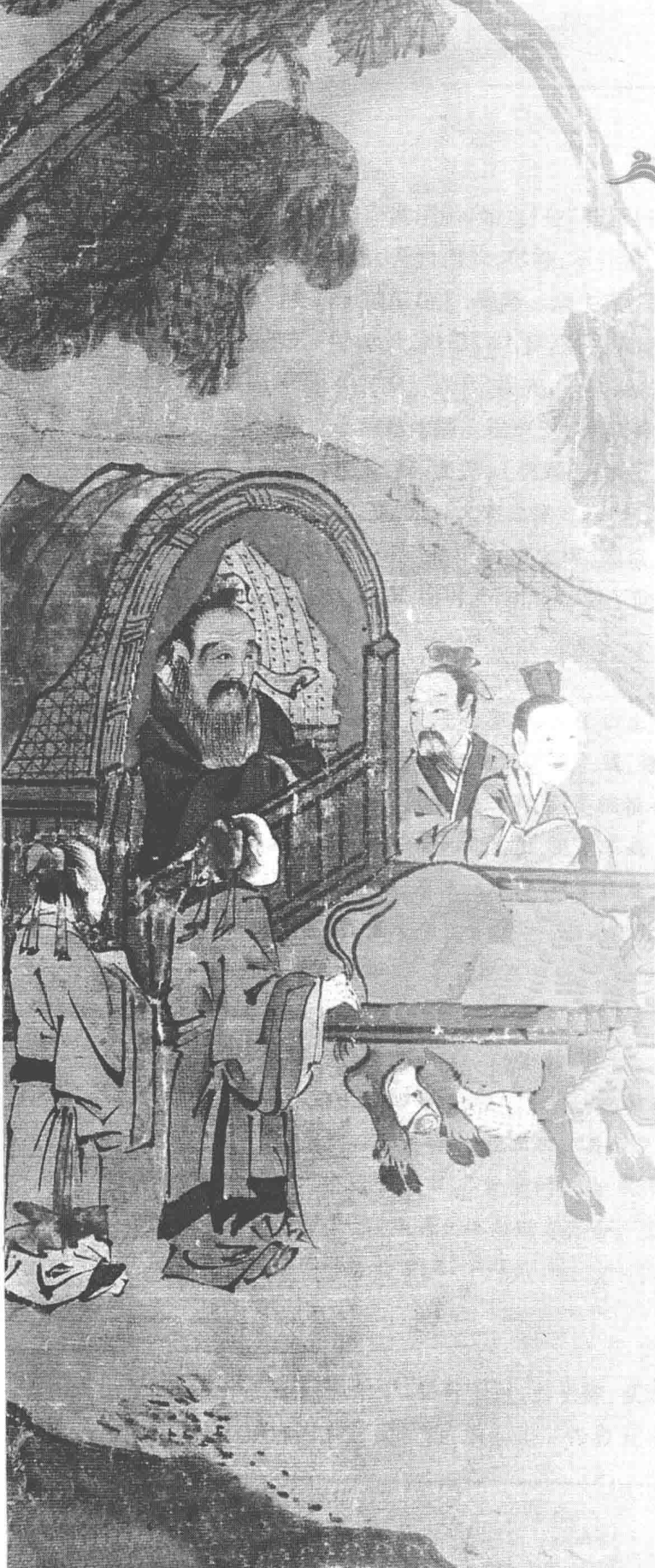
孔子家语

领悟圣哲思想智慧 萃取中华文化精华

图文珍藏版

〔春秋〕孔子·原著 马博·主编

线装书局



目 录

第一章 《孔子家语》原典释义	(1)
原序	(1)
卷一	(4)
卷二	(56)
卷三	(103)
卷四	(142)
卷五	(181)
卷六	(239)
卷七	(267)
卷八	(311)
卷九	(346)
卷十	(413)
第二章 孔子言行典籍译注	(479)
一、《论语》所载孔子言行	(479)
二、《孝经》所载孔子言行	(609)
三、儒书所载孔子言行	(627)
四、经书所载孔子言行	(856)
五、子史所载孔子言行	(1079)
第三章 孔子的伦理学说	(1291)
一、孔子说“正名”	(1291)
二、孔子说“中庸”	(1294)
三、孔子说“君子”	(1304)
四、孔子说“仁”	(1307)
五、孔子说“礼”	(1311)
六、孔子说“义”	(1313)
七、孔子说“信”	(1315)
八、孔子说“天命”	(1316)
九、孔子说“德”	(1324)
十、孔子说“忠恕”	(1326)

十一、孔子说“孝悌”	(1329)
十二、孔子说“仁政”	(1333)
十三、孔子说“刑”	(1343)
十四、孔子说“孝道”	(1353)
十五、孔子说“鬼神”	(1361)
十六、孔子说“为学”	(1367)
十七、孔子说“修身”	(1389)
第四章 孔子智慧通解	(1400)
一、孔子思想	(1400)
二、养生之道	(1419)
三、修身之道	(1485)
四、中庸之道	(1515)
五、处世之道	(1540)
六、为学之道	(1581)
七、交友之道	(1613)
八、立志之道	(1662)
九、正气之道	(1689)
十、成事之道	(1708)
十一、安身之道	(1733)
附录一：孔子年谱	(1760)
附录二：孔子家谱	(1773)

十一、孔子说“孝悌”

儒家讲“孝”，《孝经》便是儒者专门论孝的一部典籍。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孝被认为是道德教育的根本。正如孔子的弟子有子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德之本”，“仁之本”，都说明“孝”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位置。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翻译成白话是，孟懿子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仪制度。”有一回，樊迟替孔子赶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道，我答复说，不要违背礼仪制度。”樊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健在的时候，儿辈要依照规定的礼节服侍他们；死了，要依照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这里的“孝”，仅指儿辈对父母在世或去世以后所应执行的孝道。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翻译成白话是，孟武伯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答道：“父母只忧虑儿子（孝子）生病。”王充《论衡·问孔篇》：“武伯善忧父母，故曰：唯其疾之忧。”

然而孔子要深究“孝”的内涵，怎样做才算是尽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翻译成白话是，子游向老师请教孝道。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认为只要能够养活父母就可以了。对于狗马一类牲口都能够饲养。如果不存有孝敬父母之心，养活父母和饲养狗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敬”与“不敬”。然而怎样去衡量“敬”或“不敬”，这仍是一个悬而未了的问题。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翻译成白话是，子夏请问孝道。孔子说：“儿子在侍奉父母跟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但这是很难做到的。父母有事，晚辈就要效劳；有酒有肴，要让长辈食用。难道这些竟可以算是孝吗？”这些内容比上引“能养”复杂一些。然而孔子对这些举

止以为是孝却提出了质疑(“曾是以为孝乎?”)

虽然如此,孔子言“孝”,已经扩大了它的道德范围:它不仅事亲,还要事君。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

儒家将执孝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在家侍奉双亲;中年步入仕途以后,以孝心服侍上级长官直到国君;到了晚年便实现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孝成了男人立身之本。

儒家以孝事君,君以孝治天下,孝成了治国平天下的工具。而且,尽忠与尽孝,成了臣事君的两个方面,所以“孝”仍然囊括在孔子“正名”说的范围之内。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翻译成白话是,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敬重,尽心竭力加以劝导,怎么样?”孔子说:“你对待百姓的事严肃认真,百姓对待你以及你的政令就会敬重。你孝敬父母,慈爱幼小,百姓对你也就会尽心竭力了。你能够起用好人,教育那些能力弱的人,百姓也就会努力劝勉自己了。”

季康子是鲁哀公时的正卿。孔子不仅要求臣以孝事君,而且也要求君以孝育民。这里说的孝慈,已经越出了道德的范围,有着明显的政治含义了。

关于三年之丧。

三年之丧,是先秦儒家规定的丧葬制度,《论语》有翔实的记载。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

这是师生之间一次严肃而生动的对话。看来,宰我是一位改革家。他认为,三年之丧,为期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制度必然被废弃;三年不奏乐,音乐必然失传。譬如旧谷子既已吃完,新谷子也上市了;又如取火用的燧木又经历了一个轮回,所以守孝一年也就可以了。宰我主张将三年之丧的古制改为一年之丧,这



孔子逝世，诸弟子守墓

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孔子反驳道：“（按你一年之丧的说法，后两年）你吃白米饭，穿花缎衣裳，你心里安不安呢？”宰我坦然回答道：“安。”这更是对旧礼俗大胆的挑战。

孔子气愤地说：“你心安，就这样去做吧。须知，君子守孝期间，吃美食不觉得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会感到舒适，所以才不这样做（即不“食旨”、不“闻乐”、不“居处”）。如今你既心安，你就做去吧！”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言论很不以为然。

宰我走后，孔子慨叹道：“予这样做是不仁不义呀！要知道，儿女出生，三年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替死去的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通用的丧礼。宰予就没有过从他父母怀抱里得到三年的抚爱吗？”孔子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坚定地维护三年之丧的古制。

孔子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逝世，弟子们为他行“三年之丧”礼。《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

对待丧葬，儒、墨两家持有相峙的观点和态度。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

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韩非子·显学》）

孝与戾，侈与俭，孰是孰非？钱穆认为：“儒家极重丧葬之礼，为其可以教孝、教忠、教仁。儒家认为惟有对于已死的人尽力，最可发明人类自有的孝弟忠仁之内心。墨家则站在贫民劳工经济的观点上看，觉得贵族的丧礼和葬礼，最为浪费，最属无谓。”（《国史大纲》）一个持贵族立场，一个持贫民劳工立场；立场不同，就有着相峙的观点和态度。

虽然，子贡等弟子对孔子行三年之丧的礼节，然而，直到孟子时代，三年之丧并没有通行，并非如孔子所言，“天下之通葬”。

《孟子·滕文公上》载，滕定公（滕文公之父）死了，滕文公让他的师傅然友向孟子请教有关的丧礼和葬礼。孟子说：“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飧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三代”，即夏、商、周三代，听了然友的转达，滕文公决定行三年之丧礼。然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为什么会遭到滕国父老官吏们的反对呢？就因为三年之丧礼，并非“天下之通葬”。

关于孝慈。

孝顺父母为孝，慈爱幼小为慈。《论语·子路》记述了一个故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按照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译文是：叶公告诉孔子道：“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子道：“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和你们的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这就是孔子主张的“孝慈”。

然而，“子为父隐”被儒家称之为“孝”，“父为子隐”被儒家称之为“慈”，可见儒家提倡孝道的虚伪性。而这种虚伪的孝道成了维系封建宗法制度的道德伦理观念。

有的学者对此作了剖切的分析：“‘孝’这一道德伦理观念，主要是用来维系宗法制的。因为周代奉行嫡长子继承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大宗’‘小宗’的宗法制。因此，‘孝’不仅仅局限于家族伦理范围。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已扩大为‘小宗’对‘大宗’的义务，并且在政治上延伸为卿大夫对诸侯、诸侯对天子的义务。血

缘上的‘追孝’、‘尊祖’，则成为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纽带。于是，由家族到国家，达到了伦理与政治的统一。西周在意识形态上的这一特点，对后世封建社会具有深刻影响。”（步近智、张安奇《中国学术思想史稿》）这就是儒家鼓吹孝道的阶级本质，在为实现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一目标上，它为封建宗法制度效力二千多年。

十二、孔子说“仁政”

德治主要强调统治者的政治修养，认为社会应由道德觉悟很高、并能按道德原则办事的人来管理，通过统治者优秀的表率作用来正人心，治理天下。仁政则主要强调施政纲领。前者告诉人们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政治修养，它既是好官、好君、好政府完善自我的指南，也是人民衡量政府、君主和百官好坏的尺度。后者则告诉统治者应该怎样行政，是实现清平政治的蓝图。那么，这幅蓝图孔子是怎样绘制的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足食、足兵，重教、轻刑，正名，选贤才。

（一）足食、足兵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子适卫，冉有仆（驾车）。子曰：“庶（人口稠密）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前文为足食、足兵、立信，后文为庶、富、教，前后互补，构成孔子的治国方略。庶即人口繁衍；富即足食，发展生产；足兵是保证在和平环境中实现庶、富、教的必要措施；信和教，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事情，自上对下而言，要立信，自下对上而言，要受教。要发展人口（庶），增加生产力，使国民具体从事生产，加强国防的人力；大力进行物质生产，增加财富，让人民有富裕的生存条件（富之、足食）；要具有强大的国防（足兵），使人民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生活；还要搞好上下关系，加强阶级团结（信），进行教育教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教），使他们过文明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阶级关系到道德修养，孔子都考虑到了。一个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能作出这样系统全面的考虑，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不多见的。

在具体施政上,食、兵、信、庶、富、教,虽然都很重要,但也有主次之分和先后之别。

就食、兵、信而言,食居于首要地位。俗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家的稳定、社稷的存亡,首先必须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汉朝的晁错说过:“人情,一日不再(两餐)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务民于农桑。”(《汉书·食货志上》)富贵知礼仪,饥寒起盗心。对于修养高的人来说,为了人格,为了仁义,可能在饥寒之下还能坚守气节,做到“贫贱不能移”。但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无衣无食,就难免啸聚山林,铤而走险。因此,自古明君圣主,无不重视农业,重视粮食的生产。《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将粮食置于财货之首。一生最推崇大丈夫浩然之气的孟子,虽然曾劝君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对待老百姓,他也承认首先要“制民之产”,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丰年)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孟子·梁惠王上》)恒产,即固定不动、长期使用的产业,如田土、山川等生产资源。恒心,即常久不变之善心。孟子认为,天下人民,士农工商,只有读书人知道礼义廉耻,在没有固定产业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一定的人格,不致于称乱。若是一般平民,不知礼义,没有固定财产,就不可能有恒久不变的善心,什么犯上作乱的事都干得出来。此即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之名言在政治上的应用。为了安定人心,就得分配给人民产业,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解决了生存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礼义廉耻,引导他们向高尚的境界发展(引而之善)。

据《尧曰》篇记载,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亦将民和食摆在丧祭等礼仪之前。基于对粮食的重视,孔子看见庄稼就格外亲热:“夫子见禾三变也,滔滔(快活)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焉。’”(《淮南子·缪称》)禾三变,指庄稼经历了发芽、抽穗、成熟三次变化。狐死首丘,不忘其本。人也如此,人之本即粮食,故孔子将枕禾而死,示不忘其禾。念念以民食为重。孔子著《春秋》,其他灾祸多有未记,而麦禾不熟,却书之不倦(《汉书·食货志上》董仲舒说),其中的微言大义,亦在重粟而已。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汉贾谊所云:“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古今成败,多与粮食有关。诸葛亮六出祁山,又六次退却,无成而归,究其根本原因,乃蜀道千里,转输不

易,军中乏粮,难以持久作战。曹操官渡之战,曹军以数千兵力战胜袁绍十万大军,其诀窍乃是烧毁袁军粮草于鸟巢……因此,自古兵家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座右铭,自古政治家也以发展生产为改革的中心议题。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为田开阡陌封疆”,王莽的“王田制”,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等等,虽然形式不同,性质各异,但其政策思维不外“足食”“富之”而已。谁把土地问题解决好了,谁的改革就成功,否则,必败无疑。



左丘明传春秋

足兵。孔子一生提倡仁义礼智信,从来不宣传战争,甚至连讨论也不愿意。周游列国来到卫国,卫灵公向他请教战阵之事,孔子曰:“俎豆之事,盖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他觉得卫灵公无聊,不向他问礼,却向他问兵,次日便离开了卫国(《卫灵公》)。何以这里又将“足兵”作为政治方案中仅次于“食”的重要内容提出来呢?其实,这是孔子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孔子所处的春秋社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成了家常便饭,其问“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那是一个人欲横流、礼义扫地的社会,人类和平共处的公德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经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据乱之世”。在这样的乱世中要治国安民,无武备怎么可以呢?纵然要在国内行礼作乐,也需要强大实力作为保证才行。面对这样的现实,实际的孔子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武备的。

那么,孔子是怎样看待军事问题的呢?曰:注重防御,反对侵略,教而后战,以战去战。

注重防御。上文所引“足兵”即是从防御意义上讲的。孔子为大司寇时,齐鲁二公相会于夹谷,孔子相礼。行前,鲁定公相信了齐国友好会盟的鬼话,满心欢喜,

毫无戒备,准备乘着普通车子前往赴约。孔子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备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掌兵官)。”(《史记·孔子世家》,亦见《谷梁传》)。后来,齐国果然背信弃义,想在盟会时挟持鲁公,幸好鲁国事先作了准备,才有惊无险。“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正是加强防御的意思。

反对侵略。正如孔子的仁义思想是为了让大家共同快活、普天同庆一样,孔子搞武备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卫人民安居乐业,而不是掠夺和侵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国家不愿被别人侵略,孔子也绝不将侵略施之他国。因而,他坚持反对侵略战争。《季氏》载季孙氏为政,将侵略附庸小国颛臾,在季家做家臣的冉有和子路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季路)与求(冉有)也,相夫子(指季孙氏),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均贫富、和人民、安邦国的治国原则,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外交政策。这与他回答叶公问政时所谓的“近者说(悦),远者来”(《子路》)的命意相同。他认为,只要国内搞好了,文治灿然,安定团结,外国人就自然而然地感其风化,顺服于你,否则,内政不修,民怨沸腾,外人哪里肯服?就是兴师征讨也不起作用。更有甚者,如果国内未安定,却去穷兵黷武,发动侵略战争,必然后院起火,祸起萧墙。

教而后战。战争有时是必要、不可避免的;战争又是残酷的、流血的,有国有家者,不可不慎。故《老子》曰:“夫佳(唯)兵者,不祥之器也。”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孔子出于仁者之心,又怎忍随便将人们推入战争这个血与火的深渊呢?故《述而》云:“子之所慎:齐(斋)、战、疾!”孔子对战争是慎重的,不轻易提及。他反对穷兵黷武,反对“不教使战”,认为将未加训练和教导的士兵草率推进战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主张对人民加强战争教育和战术训练,并须之以时,方可从征:“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从征)矣!’”善于指挥的人对人民要进行七年的训练,才可以从事战争;在不战不已的时候进行战争,以训练有素的士兵驰骋沙场,这就是孔子的战略思想。孔子出身武士之家,其父叔梁纥即以勇力闻于诸侯,立有战功,他本人也体质魁梧,力大无比,《吕氏春秋》:“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慎大览·慎大》)又知兵知战,曾经成功指挥过

粉碎费人暴乱的战争；他传授门徒，子弟也多通军事，《史记·孔子世家》：“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生就）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孔子不与卫灵公议兵，非真不知兵，只是示其不以武力为重罢了。

以战去战。战争有时是乱之源、祸之根，但有时也是剔除社会肌体腐败势力的手术刀，是迎接和平之神降临的助产婆，因此，自古圣王也不得不利用它。故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孔子曰：“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举之丧厥身。”（《大戴礼记·用兵》）“利用而弭之”，即以兵去兵。齐田氏弑其君，孔子斋戒沐浴，要求鲁哀公吊民伐罪；公叔氏以蒲叛卫，孔子建议卫灵公讨而伐之。这与一生讲仁义礼让的孔子似乎有些不协调，其实，孔子的以战去战思想，正是仁义礼让精神的体现。《大戴礼记·用兵》载：“（鲁哀）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为其不祥也？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去暴于天下也。’”“禁残去暴”是孔子用兵的目的，是以战去战的具体说明。只有禁残去暴，才能保证人民的正常生活，才能保证国家的平安和稳定，这样，战争是保证推行仁义之政、实行礼乐教化的必要手段。从事战争正是出于爱民的仁人之心，并不与仁义相悖。鲁哀公十一年，鲁国抗击齐兵的入侵，孔子对战斗中牺牲的鲁国将士称赞有加。其中有未成年的牺牲者，按礼祭奠时只能采用“殇礼”，但孔子却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左传》）孔子弟子冉有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色，孔子就称许他有“义”。可见，孔子反对不义之战，而赞扬正义之战。义与不义，是决定孔子战争的态度之界标，这正是他仁义情怀的表现。战国大儒荀子对此也有非常深刻的思考。有人问：“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荀子曰：“非女（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荀子·议兵》）仁者爱人，故不忍心人民被暴力所害；义者循礼，故不容许公理被人所贼。军事，就是禁暴除害的。同样主张以兵除害，这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经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倡，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类共同接受的外交原则。

就“庶、富、教”言之，庶是人口增殖，富是丰衣足食，教是礼乐教化。将“庶、富”排在“教”之前，与将“足食”摆在“足兵、信之”之前具有同样道理，即《管子》所谓：“仓廩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礼记·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有求得生存的需要，也有求

得繁衍的本能。天下皆然,古今同理。马克思主义“两个再生产”理论也告诉人们:“人们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又说:“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德意志意识形态》)将两段话归纳起来,前者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后者为劳动力资源再生产,用告子的话即是“食、色”,用《礼记》的话即是“饮食、男女”,用孔子的话即是“庶、富”。告子、《礼记》立足于人的需要,认为人有需食需色的本性;孔子立足于统治者的政策考虑,认为应当对人民实行庶之、富之的政策。其着眼点只有一个,即解决人类生存、生产的起码要求。富民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想。《尚书·康诰》曰:“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孔子亦将利民爱民的惠心作为仁德之一(《阳货》),盛赞子产“其养民也惠”(《公冶长》),子产死后,孔子潸然出涕,曰:“是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那么,孔子认为怎样才能惠民、利民,使其富裕起来呢?他认为只要善于为政,就可做到“惠而不费”,能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尧曰》)。君王在上,自己又不能生产,怎样才能惠民、利民呢?那便是实行对人民真正有利的政策。汉代晁错说得好:“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汉书·食货志上》)

怎样的“资财之道”呢?孔子提出轻徭、薄赋、厚施三原则。轻徭,即减轻徭役。孔子不反对人民从事必要的劳徭:“爱之,能勿劳乎?”(《宪问》)但他主张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学而》),即使用得时,征调徭役不违农时。《尚书·尧典》曰:“食哉唯时。”此语意即应在农闲时抽调徭役,“岁月日时无易(错乱)”,于是“百谷用成”(《尚书·洪范》)。让人民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服役,虽劳之而无怨:“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薄赋,即反对超经济剥削。在生产十分低下的古代社会,统治者食税过多,聚敛无度,必然造成人民的饥饿。《老子》曰:“民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厚。”如果劳动人民生活成问题,就不能进行两种再生产,因此孔子要求统治者用薄赋以养民力:“薄赋敛则民富。”(《说苑·理政》)与老子一样,孔子也认为统治者的多欲是造成盗贼公行和社会不安的原因之一:“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可是,贪鄙的季孙氏还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虽“富于周公”,还叫冉有为之聚敛,难怪孔子要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了。厚施,即重施恩惠于民。“博施济众”是孔子的远大理想(《雍也》),而厚施就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季康子欲增加

赋税,叫冉求问问孔子行不行,孔子三问而不答,最后才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施取其厚”,既可结恩于民,又可培养民力,还可藏富于民。人民富裕了,国家还有不富裕的吗?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荀子曰:“下贫而上贫,下富而上富。”(《荀子·富国》)先富民而后富国,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

(二)重教、轻刑

重教,即重视礼教。上文所引的“信之”、“教之”即其事。信之,使人民相信统治者,这是身教。教之,则可归属于言教。儒家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社会应是有秩序的社会,人民应该在秩序中过文明的生活。教,正是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理性,理解社会的秩序,明白文明的规范的必要措施。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曰:“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导)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海之。’王事具矣。”(《荀子·大略》)人是有食色本性的动物,故首当足食和富之。但是,人又是具有爱类、和群等社会性的高等动物,故需要教之海之,让他们在人格上自觉、在道德上自律。教,正是在“足食、富之”基础上,提高人们个性修养、增强人的道德觉悟的积极措施。孔子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情怀,主张积极施教,向人民晓谕事理,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促成人们知礼知节、知规知矩,过合乎道义、合乎礼教的文明生活;从消极意义讲,可以规劝人们遵纪守法,循规蹈矩,避免陷于刑律。孔子反对那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的愚民、悯民作法,尖锐指出:“不教而杀之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尧曰》认为不对人民进行教育,却实行严刑峻罚,这无异于坑民、害民。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名言来概括: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可使”,“不可使”的“使”,即“小人学道则易使”的“使”,“易使”是人民大众知晓“义”之后达到的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状态。孔子认为,如果人民知道规矩,依礼而行,那就可以放手让他们去自由行使权利;如果还不知道规矩,不能依礼而行,那就要开导他们,使其知道。这是“教之”的准确表述。轻刑,即不以刑罚为重,这一

思想体现在下列格言之中：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三）为政在人——选贤才

政治是管理科学，是人管理人的科学，没有好的管理者，怎么进行政治呢？故找到理想的管理人选是政治最重要的事情。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人才是政治兴衰的保障之一，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当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选贤（《韩非子·难三》）。当仲弓为季氏宰，问计于孔子，孔子曰：“选贤才。”（《子路》）当子路问治国之术于孔子，孔子还是说：“尊贤！”（《说苑·尊贤》）

孔子认为，得贤可以立政，得贤可以治国，得贤可以王天下。他对古代养贤尊贤之人，知贤用贤之君，佩叹有加。卫灵公是有名的“无道”之君，“其闺门之内，姑姊妹无别”，孔子反而称他为贤君（《说苑·尊贤》）。鲁哀公、季康子困惑不解，孔子回答说：“仲叔圉治宾客（外交），祝鮀治宗庙（礼仪），王孙贾治军旅（军事）。夫如是，奚（怎么）其丧？”（《宪问》）任用贤才，纵然是昏君庸主也可长保国祚。介子推年方十五，为楚国相，孔子甚感奇怪，派人前往考察，回来的人说：“廓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孔子听后说：“合二十五人之智，智（聪明）于汤武；合二十五人之力，力（强劲）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说苑·尊贤》）得贤合众，集思广益，虽毛头小伙也可治理天下，而况一国乎！齐景公曾问孔子曰：“秦穆公国小处辟（僻），其霸何也？”孔子曰：“秦，国虽小，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投（百里奚），爵之大夫，起累（纆）继（拘捕）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孔子世家》）秦穆公任用贤人而称霸西戎，孔子认为虽王天下也是办得到的，何况才称霸诸侯呢？其渴贤求贤之意，溢于言表。鲁国孟献子“以畜贤为富”，“孔子曰：孟献子之富，可著于《春秋》。”（《新序·刺奢》）而臧文仲不举贤者柳下惠，孔子斥之为“窃位”（《卫灵公》）。凡此，无不体现出他敬贤、爱贤的热切之心。

孔子的人才思想可归纳为：先德后才，德才兼备；量才录用，不求全责备；不避亲疏贵贱，唯才是举；注重实际，不为表象所惑；信之任之，大胆用人。

先德后才，德才兼备。《说苑·尊贤》：“孔子曰：‘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智）能焉。……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智）能者，然后任之。’”

故曰：亲仁而使能。”“忠信重厚”、“仁信之诚”为品德修养，属于德。“知能”，为才干本领，属于才。对同一个人，应当先考察他的德，然后考察其才：“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对于一群人，应首先注意有德者（“仁信之诚者”），然后注意有才者（“知能者”）。对有德者采取亲近的态度，而对有才者则采取使用手段。可见，孔子在考察人才时，是先德后才，亲德使才。最好是德才兼备，其次是亲近有德之人而使用有才之人。这种思想在另一则故事中表达得十分清楚：鲁哀公问孔子：“请问取人。”孔子对曰：“无取健，无取詘（gān），无取口哼（tùn）。健，贪也；詘，乱也；口哼，诞（夸张）也。故弓调（正）而求劲焉。士不信恚而多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迩（近）也。”（《荀子·哀公》）倘若一个人不诚、不信，而有才干，那犹如尖牙利爪的豺狼，是千万不能够接近的。这就是先德后才的必要性。

哀公问曰：“何为而民服？”孔子对曰：“举直（有德）错（置）诸枉（歪邪），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

这个道理与“负且乘致寇至”、“政者正也”的道理相同。

量才录用，不求全责备 在个人才能方面，孔子主张用人如用器，有一分长用一分长，有一分才用一分才：“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又曰：“无求备于人。”（《微子》）人各有长，用其所长，弃其所短，则世不乏才。

不避亲疏，唯才是举 春秋之时，世卿世禄，位势津要皆为贵族所把持。孔子主张受过教育、德才优秀的平民子弟也可以进入仕途，参加管理。他说：“先进于礼乐，小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又说：“犁牛（耕牛）之子辛（赤色）且角（角形周正），虽欲勿用（祭神），山川其舍诸？”（《雍也》）孔子有个弟子名仲弓，有才有德，“可使南面”统治天下，可惜他出身贱微，按礼制，是没有资格从政的。孔子说：耕牛的儿子长得毛色瑰丽，角形周正，山川之神难道不喜欢它吗？于人亦然。因此，孔子对选伊尹于厨师之林的汤、举五羖于纆继之中的秦穆公，赞赏有加。与之相联系的是，孔子还鼓励人们出于公心，唯才是举，不避亲仇之嫌，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祁黄羊的赞赏上。《吕氏春秋·去私》云：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你）之仇邪？”对曰：“君问（孰）可，非问臣之仇了。”平公曰：“善。”晋平公遂用之，果然不错，国人称善。后来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